

用“换饭碗”的办法 来精简机构必须严防 权力进入交换领域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府很难自己解决自己的冗员问题。还是改革年代的群众有创造力。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找到了办法。我记得这个办法最早是卓资县创造的。这个办法具体介绍要千言万语,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先造一个“金饭碗”,用“金饭碗”来换国家干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造“金饭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经济实体,或者把某些政府部门转变成经济实体。这些在经济实体里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是一身二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全变成了商人。既精简了机构,又活跃了经济。

官员们在“换饭碗”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权力实现经营目标。“下海”的官员也会很方便地找到领导人为他批条子,要到种种优惠,或无偿得到地皮。这样,权力也就进入了市场。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

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自己去踢球,球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看来,用“换饭碗”的办法来精简机构,必须严防权力进行交换领域;要保证中国改革大业成功,必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也必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

(摘自2月11日《经济参考报》杨继绳的文章)



“三个有利于”是 判断各方面工作 是非得失的标准

何祚麻在《真理的追求》1993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就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所提出,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所强调,并且在十四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所最终表述的:“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为什么各项工作都要以“三个有利于”,而不是以“一个有利于”,亦即不仅仅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十四大报告》)

1978年,“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十四大报告》)

然而实践有三种基本的形式: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中的实践标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而不是只局限于“一个有利于”,或局限于“生产力标准”。

把“三个有利于”归结为“一个有利于”,其后果之一,就是抽掉了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抽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抽掉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这些“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写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的根本标准”一段著名的话。十三大正确地规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所以也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然而,经过社会实践,到了十

四大,这“一个有利于”就发展为更为全面而准确的“三个有利于”。纵观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其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观察,都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总的出发点”。例如,在估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取得的成绩上,就概括为“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整个报告都不再有“生产力标准”这样的概括。

(辑摘)

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改革》1992年第6期刊载李仲周的文章谈到,关贸总协定既是一项含有一整套多边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契约,又是缔约方之间相互进行贸易谈判的场所。它共分4部分包括38条条款,可归纳为以下主要原则和规则:

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二、互惠原则或称对等原则。贸易减让要有给有取,互惠互利。对发达国家来说是总体减让对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互惠,因为总协定中的发展中国家条款规定,发达国家在作出贸易减让时,不应期待发展中国家给予对等的回报。

三、非歧视原则。这是关贸总协定的基石,也是其成功的奥秘,它包括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实指国内外同类产品享受同等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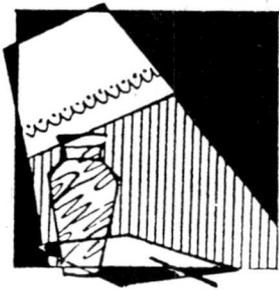
(颖摘)

政府机构应砍掉十分之八九

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来源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形成了中国人习惯称做的“大锅饭”格局。第一步,把企业、职工变懒、变蠢。因为,一切由万能的政府安排,一切经济责任和风险由政府主管部门承担,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干与不干都一个样,故懒惰成风,智力日下;第二步,由于低效率、低效益导致国有企业大量亏损,使国家财政枯竭、国贫民穷;第三步,几十年坚持计划经济不变,在穷社会主义与富资本主义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必然败下阵来。这“懒—穷—垮”的三部曲,难道不是20世纪的一出历史悲剧吗?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的弊端,又是同庞大的官僚机构相联系的。下一步深化改革、构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真正动大手术,把古今中外最庞大的政府机构砍掉十分之八九。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可资参考,其中央政府管经济的部门只有大藏省、通产省、农林省及经济企划厅四个部。

(摘自1993年第1期《财贸经济》作者熊映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一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同的;但在“市场经济特殊”上,两者又是根本不同的。其根本不同又源于由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下实行市场经济,并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大字,表明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道路和目标。

当前,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即不少主张市场经济的同志,只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这种认识失之偏颇。因为市场经济的共性寓于某种特殊性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所以,既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要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制度性特征,指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二是主体性特征,指的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三是结合性特征,指的是在运行机制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使“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性作用,使“看不见的手”发挥控制性作用。

(摘自2月2日《改革时报》郭代模的文章)